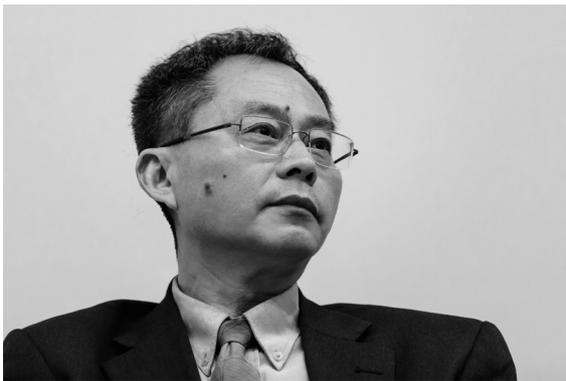


学术史、思想史和人物研究

—— 罗志田教授访谈

● 罗志田 ○ 张洪彬



● 罗志田,男,1952年生,四川乐山人,先后毕业于四川大学、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历任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任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学术史、思想史和外交史。著有《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1995)、《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1998)、《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1999)、《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2001)、《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2003)、《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2003)、《激变时代的文

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2006)、《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2009)、《经典淡出之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2013)、《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2014)、《近代中国史学论述》(2015)等。

○ 张洪彬,《学术月刊》编辑。

○ 罗老师,您好,很高兴您愿意接受访谈。《学术月刊》的访谈旨在梳理知名学者的学思历程,帮助读者把握该学者的问题意识、核心观点、方法论等,从而整体性地理解该学者。首先,请先谈谈您是如何走上学术道路的?

● 我可能要让贵刊失望了。我其实就是考上大学后要找工作(当年叫“参加革命”),有幸到四川大学历史系读书,毕业分配到四川师范学院(后改名大学)历史系工作,就这样“走上学术道路”了。

○ 据说您早年的兴趣在文学方面,请问文学修养对您的史学研究有什么影响?您颇具特色的行文方式,是受文学影响,还是出于某种特定的史观?

● 我们考大学时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那时填志愿

主要不考虑兴趣,而是看什么可能考上。我在此前实际只上过不到一年的中学就“停课闹革命”了,后来虽然也有短暂的“复课闹革命”,其实仍是不念书的。这样的水准,只能选门槛最低的学校和科目。我填的第一志愿是成都师范学校的语文高师班,就是中专办的大专班。第二志愿是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第三志愿感觉需要改改专业了,就填了四川大学历史系。后来是重点大学先入场,以成绩录取。我侥幸考了还不错的分数,就被川大历史系录取了。所以不敢冒充说早年的兴趣在文学,这样可能会被文学领域的人笑话。

至于行文方式,可以肯定既不是“受文学影响”,也不是“出于某种特定的史观”,大概就是自然形成的。部

分可能因为前些年各学刊都把字数限得很低，我在写作时有意无意间会尽量压缩文字。所以我常对学生说，我文中每一个字都有意思。可能养成习惯了，所以形成了您所说“颇具特色的行文方式”，记得陆扬老师就感觉我的学术表述压缩得很厉害（大意）。

○ 在您的学术成长过程中，在国内对您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四川大学。在1987年在赴美留学之前，您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兴趣、研究方法。可否为我们讲述一下四川大学的史学传统对您的影响？

● 可能因为贵刊过去采访的都是“知名学者”，所以提问的立意较高。我在留学前真不能说“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兴趣、研究方法”，现在也只能说是有了自己的研究兴趣，不敢说有什么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我对史学的理解和认识，的确是在四川大学奠基的。

结合今日的后见之明和当时的感受，我感觉川大老师的思路很开阔，那时“文化大革命”还不算完全结束，思想和学术都有不少禁忌甚或“禁区”，而川大就有老师把钱穆的《国史大纲》列入参考书了。同时教外国史的老师旧学修养相当深厚，也是一个特色。例如指导我最多的顾学稼老师，毕业于美国名校（伯克利加州大学），或因有家学渊源，中国文史修养恐怕还超过一些教中国史的老师。在这样的学风熏陶下，或许学生的眼光会更通达一些。

川大的史学传统，据说一是重史料，二是重工具。前者更多是听说的（有老师说，那时中国社科院的历史研究所里，约有三分之一是北大毕业的，三分之一是川大毕业的，其余三分之一来自各大学。北大毕业的思想灵活，而川大毕业的史料扎实），后者我有亲身感受（我们同时毕业的同学考外校研究生，不论考什么专业，古汉语和外语成绩都非常好）。

川大历史系的另一个特点，可能是看重表述能力。1950年后，各大学一般都由名家任系主任，但真正管事的是党总支领导下的类似系秘书一类的中青年老师，这些人中不少后来担任了副系主任。川大历史系长期是徐中舒先生任系主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管事的是柯建中老师（“文革”前仅是讲师）。柯老师文史兼修，读书极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深厚，文采也非常好。可能因为是他长期主事，留校的老师大多非常能说（至少中国史如此），上课很吸引人。更老一辈中，缪钺先生也是特别讲究表述的老师。这样的潜移默化，会影响很多学生，尽管我在这方面没有得到真传。

○ 在美国留学七年，您想必对西方中国学界甚为了解，但从您的著作来看，您对西方史学界、中国学界的问

题意识、术语、解释框架等似乎着墨不多。不知这样的观察是否贴切？可否谈谈您在中国本土史学与西方史学传统上的倾向和取舍？

● 在美国那些年的学习对我的提高非常大，真正是获益匪浅。当然，我不觉得要说话写文章都像外国人，才算是外国念了书。我比较赞同史无定法的主张，就像我对史料不太区分什么第一手、第二手一样（通常的区分都是基于史料的产生和存留，我以为最适合研究题目的史料，就是第一手史料，而不必考虑其出身。史料的形成及其保存和流通的经历都非常重要，但不一定体现在可用次序上），我也不太区分什么中国本土史学与西方史学传统，任何能帮助我们认识历史、说明历史的方式方法，都可以借鉴，不必问其出身。到目前为止，我做的都是具体的研究，确实很少涉及到“术语和解释框架”等相对虚悬而高远的面相。至于“问题意识”，我在中国和美国念书时都没听说过（不是客气），所以除非在上历史方法课的时候，一般不敢高攀。

○ 阅读您的作品时，发现中与西、旧与新的消长、混溶和缠斗，显然是您多年以来一直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可否讲讲，这个问题为什么让您如此着迷？

● 如果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定在19世纪，新旧中西（以及满汉）本来就是近代史的核心问题。一方面，这是历史当事人自己分出的类别，我们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中西新旧的缠结实在太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基本就是常态。可能因为很多人还是比较愿意接受黑白分明的历史叙述，而我希望更多呈现历史那丰富的一面，所以侧重多一些。尤其当自己的说服力不够时，就不得不再三陈述，结果就写了许多出来啦。

○ 读您的《胡适传》，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您回避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标签，描绘了胡适在率性与作圣之间的紧张，并以此来理解胡适的人生道路。这与许多人物传记都甚为不同。在本期发表的有关梁漱溟的论文中，您也特别关注他及其时代中体现出来的矛盾和纠结之处。其中透露出您的方法论自觉。可否请您从方法论上谈谈您对人物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的看法？

● 那本《胡适传》是一套丛书中的一本，原是想写给学院外的普通人看的，所以我在书中对各类名相的使用都有所收敛。不过我倒无意“回避”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名相，实际上两皆有所使用。至于率性与作圣之间的紧张，可能受到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同时也是在一个相对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对理学家而言，“率性”是有特别含义的，而胡适的父亲就非常亲近理学），感觉比较能表

现出胡适身上那种既想收敛又不得不有所为的紧张。

其实那一代读书人身处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从废科举到新文化运动，在不过十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了立宪、共和取代帝制、白话取代文言等以千年计的根本性巨变，如果再加上经典的退隐和四民社会解体这类非建制性的长程巨变，任何人都可以了解那就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像胡适和梁漱溟这一代人（梁漱溟比胡适小两岁），就亲临并目睹了这样一种多项根本转变的发生，其感触非比寻常，思虑也当更高远。且胡适和梁漱溟都相对长寿，活到70岁以上，一生经历三次改朝换代，又更非寻常可比。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他们刚经历了第一次改朝换代，那时还比较年轻，可能更有激情，更多兴奋（有时也比较容易激动）；往往期望甚大，不满亦多，而失望也可能很大。到晚年久经沧桑之后，他们的体味和领悟，对人生、社会、人类社会的思考可能很不一样，尤其值得参考。

那一代人身历从一统天下到万国并立的转变，面临“天下”的崩散，忽然接触到类似世界与中国、国家与社会这类新范畴，因应着新时代的挑战，又传承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天下士”遗风，往往处于一种两难的紧张局面。胡适甚至自己说他一身之上同时存在着“中国的我”和“西洋廿世纪的我”两个新旧中西不同的“我”。这是他们切身的感受，我们写历史的人，有责任把历史当事人自身的感受表现出来。

贵刊这一期关于梁漱溟的文字，恰好也涉及到上面所说的新旧中西的缠结。梁漱溟和胡适相似，多少都有“暴得大名”的经历。过去我们的叙述，是把梁漱溟放在旧和中的一边，而把胡适放在新和西的一边。这不能说不对，但稍嫌表面化一些。因为那时的趋新与守旧，都已不像字面义那么黑白分明。新的一边，用鲁迅的话说，“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而“旧”的一方，如邓中夏所看到的，“面子上却满涂着西洋的色彩”。

更重要的是，在梁漱溟引起的这次争论中，很多参与讨论的人，并不在新文化人和所谓“东方文化派”两方之中，而其观念和态度，也很难拿新旧、东西（中西）这样二元对立的范畴来概括。那时新旧中西的关联、互动与竞争，形成相当错综复杂的局面。不少本意接近的主张和观念，未必走到一起，甚或演为对立。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攻击梁漱溟最厉害的，并不是胡适等公认的尊西趋新者，而是一些文化态度更接近东方文化的人。而趋新和守旧，又可并存于一人之身，所以会出现梁漱溟这样守旧的趋新者。

这些只是把我看到的历史现象陈述出来而已，谈不上

什么“方法论自觉”。不过我也愿意就人物研究和思想史研究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人物研究本是中国史学的强项。过去史书的主体是所谓“纪传体”，就是以人为本位来构建历史。尽管这一传统在近代遭到强烈质疑，尤其梁启超所说的“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流传甚广。后来中国史学受到西方史学讲究结构、功能、趋势甚至规律的影响，个体的人日益从史学论著中淡出，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历史著述的“可读性”降低。其实梁启超也曾尝试侧重一个人来写中国史，如他为李鸿章作传，便命名为“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后来他观念转变，更曾提出“用纪传体做一百篇传来包括全部历史”的通史计划，打算分门别类地选择历史上一百个人物做成传记，就可“包括中国全部文化的历史”。可惜这修改后的观念流传不广，远不如他那破坏性的家谱说。

与梁启超不同，胡适较早就对那种以规律解释历史的倾向有自觉的怀疑和抵制。他认为“历史事实的解释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一个‘最后之因’就可以解释了的”，而是“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一个时代的历史是由“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所以，胡适主张“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不必总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的历史事实”。我们要注意胡适把“多元”和“个别”落实在个人传记之上，表现出他对历史当由个体的人组成，有相当自觉的认识。

这里当然还有更多的牵涉，如历史重在说人还是说事，或历史叙述应当以人为主还是以事为主，就一直存在争议。像刘咸忻这样被视为偏旧的史家，也主张历史虽以人为中枢，史学却当偏重述事而非论人。在他看来，史书中的列传虽以人题篇，其实是以事义统人；表面是在说人，其实仍在说事。这虽像是技术层面的辨析，其实涉及到历史表述的核心观念，不可等闲视之。

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的主体性也主要表现在人的身上。所谓人能弘道，道亦弘人。一个人未必能代表一个时代，但一个时代确实可能因为某个杰出人物而得到表述，某一个人也可能因为时代的重要而引人注目，并在时代被弘扬的过程中表现自己。

思想史研究与人物研究的关联非常密切。20世纪早期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往往不分，或连起来称为学术思想史。那些名著基本是以人物为中心，可见所谓“学案体”的痕迹。后来从学案体转向，改称单独的“思想史”，一般视为进步，却也渐渐疏离了作为思想者的人物。再以后受苏

联学风影响很大，思想史研究更多偏向哲学理念一边，思想者就进一步淡出了思想史。

我的看法，思想史研究应当让思想回归历史。思想史完全可以也应该是思想者思想的历史。因为多数思想观念都是在反复表述和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伴随着各式各样的理解、甚至各种歧义和冲突，在不断辩论和竞争中发展的。任何一个具体见解的提出者和先后参与争辩者，又都有其特定动机和意图，常受时空语境的限制。简言之，思想是行动，而且是有意的行动，并始终处于行动的状态之中。如果不能让读者看到思想者怎样思想，不能展现立说者、参与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互竞进程，大概就很难说是“历史上的思想”。

据说孔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思想史研究如果采取“见之于行事”的取向，回到“思想”的产生过程中，落实到具体的思想创造者和思想争辩之上，思想史会因增强活力而吸引更多的读者和参与者。

○ 您研究的人物既有梁启超、胡适这样转移时代风气的人物，也有像梁济、刘大鹏这样较为边缘的人物。请问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些影响力并不太大的人物？在您看来，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近代思想人物？

● 研究什么人往往不一定是有意选择的，而是因缘际会的产物。至少我专门写一本胡适，就完全出于偶然的原因。那是1994年的事了，我在向隗瀛涛老师请教时，得知他受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委托拟主编一套“强国之梦”丛书。原策划者已经拟定了十位研究对象，并找好了十位作者。隗老师似乎希望尝试“知人论世”的取向，通过系列人物的研究来展现历史概貌，并征询我的看法。我记得拟定的十位研究对象包括洪秀全，而没有曾国藩、梁启超和胡适。于是冒昧提出：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很大，但就对当时人的影响言，洪秀全恐怕不如曾国藩（且不论其“革命”与“反动”）。而近代最能影响其同时代人的另外两人，则是梁启超和胡适。

我原不过顺口一说，没想到隗老师立刻予以鼓励。后来洪秀全与另一人果被删去，而增添了梁启超和胡适。他知道我写过有关胡适的论文，即命我担任胡适一书的撰者。我从没有为胡适写传的思想准备，但隗老师以胡适的“尝试”精神鼓励我一试，并指出胡适入选本由我提出，因而我也有“义务”写作此书。我就这样成了这套丛书的作者，但研究胡适确实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至于刘大鹏，记得是在念研究生的时候，曾听王汎森兄说刘的日记很有意思。那书印得不多，销售不甚好却不

容易买，回国后竟然通过朋友买到一本，于是写了篇书评，然后进而写了篇与科举相关的论文。写梁济大概也有类似的偶然因缘，并非刻意要选您所说“较为边缘的”或“影响力并不太大的”人物（后来刘大鹏就成了名人，不一定边缘啦，刘家真应感谢那位帮我买书的朋友）。不过，我倒觉得这类人物对历史的影响虽不如梁启超和胡适那么大，但他们对说明历史的作用，却不一定比梁启超和胡适小。

兰克曾说：“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每个时代的价值不在于产生了什么，而在于这个时代本身及其存在。”我一直相信兰克这一见解可以推广，不仅时代，大至文化、族群、国家，小至个人和细事，都有其独立的“主体性”。从这个意义言，刘大鹏和梁济直接面对历史，与历史相关联，正与梁启超和胡适同。比他们更“边缘”的人物亦然。只是太过“卑微”的人物在历史上往往失语，不一定是史家看不起他们，实在是因为他们自己不能写作或没条件写作，而别人对他们的记载也不多，留下的材料太少，很难据以表现历史（除非有史景迁的本事，能为一个有姓无名的女性写一本书）。

通常地位高到可以“养尊处优”的人，眼中往往没有普通人，从他们的记载中很难看到一般人的身影。而像刘大鹏这样地位不是太高的人，与老百姓的接触较多，又有书写和记载的意愿和能力，更能反映（他们心目中认知中的）大众生活。我想，值得关注而尚未得到关注的近代思想人物还有很多，最理想的就是上面说的，自己有记载的意愿和能力，又相对亲近普通民众。

○ 在您的研究中，中国史学史、中国学术史占据着相当的比重，可否解释这一现象是因何而成？史学史、学术史对于近代思想史乃至近代史研究，有着怎样的意义？

● “这一现象”大概仍是因缘际会而成的吧。很多时候可能是因其他的研究涉及某方面的背景，参阅已出的论著没能解决问题，只好自己进去探索。或者是有不能推托的人（长辈和领导）约稿，于是进入这些领域。还好我一向读书很杂，对这些领域本有兴趣，相关材料也曾用功，故可勉强应付。而且在历史系教书的人，对相关的中国学术史和中国史学史，不能全无心得。你在课堂上提到什么书或论文，不能不放到学术脉络（有时还是非常具体的脉络）中去理解，所以这方面的基本史事和研究状况，是必须熟悉的。再加上学生最喜欢问治学方法一类问题，任何方法都与所在时段的学术典范相关，而典范又可能转移（在20世纪更经常转移），如果不了解学术史，不能说明某一时段的学术典范，也就很难说方法。就此而言，史学史和学术史是“近代思想史乃至近代史研究”的基本功，

是不可或缺的。

附带说，你提到的“学术史”，可能是我们史学界一个带有困惑的问题(issue)。昔年黄宗羲写了《明儒学案》，后来梁启超说，“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这个见解常被引用，其实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创新”。因为“学案”所重的是学术家派，虽含有史的内容，却不必就是“史”。这在以前本是常识，但梁启超影响太大，从那时起，这一创新的“特识”就渐成新的“常识”，并基本取代了既存的常识。

比这更创新的是，近年一些学校历史系的师生不知什么是“学术史”，往往把这一词语放在论文的序论之中。我曾多次在课堂上说“学术史”不宜这样使用，因为这一词语在您提问的含义下使用已至少近百年了，作为学术前辈，我们恐怕不能不尊重学术上的先行者（好像日本就把既存研究称为先行研究）。试想假如梁启超生在今天，要用他那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来拿个“论文博士”，按照这些学校流行的表述法，岂不是必须在学术史中写学术史！借用年轻人的网上用语，这样勉为其难，让他情何以堪？上述那些学校的历史系估计没人研究学术史，否则便已经出现“在学术史中写学术史”的又一创新啦。

这个责任当然不在学生，首先是我们研究学术史的没能让其他人知道“学术史”是什么；其次学生所受教导便如此，做起来自然理直气壮。某次一位念书很好的同学告诉我，因为论文中都要讨论既存研究，需呈现历史发展的动态，所以特地不用什么静态的“研究综述”，而必须使用“学术史”。其实中文词汇中类似的意思还有一些，不一定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抉择。更不妙的是，现在我们很提倡“与国际接轨”，假如某篇论文优秀到需要翻译成英文，应直译还是意译？直译估计别人看不懂，若意译，又很难译回中文（就像我们很多学生喜欢学日本说法，学位论文题目中常加上“以某某为中心”，但我们现在又要求把学位论文摘要译成英文而不是日文，结果多半只能改译。那英文题目若再译回中文，便与原文两样了）。

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我们的“学术史”研究还任重道远。

○ 您治史三十多年，不仅著作等身，还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学生，可否请您谈谈，选择和培养学生，您最看重他（她）什么特质？先天禀赋是否重要？您如何对学生开展史学训练？会特别注重训练哪些方面的能力？

● 如果我真培养出了优秀的学生，那都是学生本身够优秀。这不是客气话，现在的计划教育取向，本身优秀的学生都不一定能表现优秀，遑论其余。

前段时间接受山东大学研究生的采访，也问到类似的问题，这次回答与其相近。我招收的学生不算多，博士生平均一年一人左右，硕士生更少一些。史学是一门很辛苦的学问，不“合适”的人很难做好，所以招生确实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现在讲究学术正确（套用美国“政治正确”的说法），老师可不敢说“看重”考生的什么特质。具体的要求，首先当然要通过大家都一样的笔试。口试的时候指导老师稍有些主动，不过现在也不容易了。如我们四川大学贯彻上级指示，博士招生面试一次要十位正教授同时出席，整个过程还要录像，至少录音。这举措据说是为了保护学生，却把老师当成犯罪嫌疑人，很能体现大学老师在管理者心目中的形象。且这样口试效果未必好，因为考生忽然面对十位教授的大阵仗，自己先就紧张起来，善读书的临场发挥未必佳，善发挥的读书又不一定好（天才除外）。

在以前的口试中，我希望了解考生平时看不看书、看了多少书，是不是在思考问题，以及思考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或她是否适合跟着我学，也就是看学生对未来学习的预设是不是在我力所能及的领域。这不是说客气话，因为我们现在实行的是计划学术，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任务（有时任务还较离谱，例如规定学生读书期间要在特定刊物上发表多少篇论文）。现在各学校的教育取向不一，有的相当趋新，有的又比较“保守”。我对研究的领域持相当开放的态度，但只能在我擅长或足以应对的领域里招生。简言之，在各式各样的限制之下，老师和学生在研究方向和风格方面，起码要有一些共同之处，多多益善。如果一开始师生就不合拍，双方可能在痛苦中度过两三年、三四年。老师只是增添痛苦，学生就吃亏太大，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学术成长。

至于先天禀赋，对从事史学研究而言，有没有天赋一定是有差别的。若有特定方面的天赋，会比普通人强一些。不过天赋异禀的人终是少数，所以学术训练的作用和目标，都是要使没有某方面能力的人能够通过训练具有这方面的能力。若天赋大体相当，更能看出训练的差异。

我对学生的要求以严格著称，首先体现在阅读量大，有学生背后甚至用“恐怖”来形容；另外就是谈话时直来直去，不留面子，有时可能还语中带刺，让爱面子的学生很不舒服。过去自以为这是对他们好。2008年的汶川地震，十万人瞬间离去，让我明白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未必人人都愿意为成长而痛苦，此后开始放松。不过坦白告诉您，至少对学术成长而言，效果并不好（有位在台湾教书的朋友，也是因严格而让学生不满，后来就放松了。他也告诉我，学生的“出息”也从此同比下降）。所以这真是两难。

我知道现在提倡学外国，对学生要永远鼓励赞扬。但外国还有其他一些我们没有的文化和背景，所以这样做是不是真有利于学生成长，我有些怀疑。尽管如此，也在尽量学着做。

具体到我对学生的训练，理论上我是采取因材施教的方式，即让学生能发挥其长处，而尽量弥补其短处。这话易说不易做，成功时彼此都很愉快，但不少时候也会有痛苦，尤其是在指出并纠正学生缺点的时候。这恐怕是老问题了。孔子曾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据说朱子就是这样教书的。昔年胡大时（季随）从朱子学《孟子》，日问其一条，季随以所见解之。朱子总以为非，说他读书卤莽不思。胡“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大概朱子对愤悱的要求太高，让胡季随得了抑郁症。陆九渊就以为，像这种简单的内容，不妨“早说于他”。

以前我教学生，会更多指出哪些不对和不能做，希望能借此诱导其“自得之”，逐步走上正确道路。后来发现这样总让学生感觉没做好，总在受打击，显得过于严苛，也常使他们产生郁闷之感（对此我深感抱歉）。后也曾改为陆九渊式的正面引导，即直接说出某题可以怎么做，怎么做更好，怎么做最好。希望给出由近及远的选项，让学生择其性所近者而从之。结果似也不理想，可能是学生尚未至愤悱之时，老师就主动提供了选项（因为怕迟了会产生抑郁）。有学生就表示：老师说的似乎都很好，但所说最低的要求也可能太好，我们做不到。可知教书不容易，左右都难逢源。

我的理解，所谓“因材施教”，不能因学生程度不高就授之以低；在进行诱导时，也不能完全将就其实际程度，最少要在其实际程度前面一点点——既给人以希望，而

又不“道破”。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型”，非常难做到，只能作为今后努力的方向了。

由于是“因材施教”，所以我不会抽象地特别注重训练某些方面的能力。不过我比较注意提高学生的书面和口头表述能力，而且要在单位时间或字数里表出自己最想要表达的意思，并提出依据证明之。因为现在刊物对论文大致都有篇幅的规定，而所有的学术会议也都规定发言的时间。我上讨论课，就把这方面的训练当作一个主要目标，引导学生习惯于最先说出最主要的，然后说出次主要的，并证明其所说是重要的，不重要的就不说。我们现在求职，不也需要在几分钟内说明自己，证明自己，并“售出”自己吗？

○许多学者在积累多年之后，往往都希望撇开具体的个案研究，就一些宏大的议题做出整体性的思考。自然，也唯有资深学者才能驾驭得了。这里想打听一下，您是否有这样的计划或打算？接下来打算开展什么研究？

●我过去多做具体的个案研究，也会整体性地思考一些较大的议题。因为对一个时代的历史没有框架性的思考和把握，具体的个案是没法研究的。现在并不打算“撇开”具体的研究，但确如您所说，可能要尝试把有些长期思考和探索的较大题目先写出来。实际上这几年写书的时间已多于写论文，最近因偶然的原因写到了梁漱溟和东西文化，仍是您说的具体个案一类，大概是一本书的篇幅。同时也在写另几本书，一本是关于辛亥革命如何发展出来的，一本是关于近代中国对革命的憧憬，一本是关于经典在近代的淡出。其余有半稿以上的还有几本，慢慢努力吧。

（责任编辑：张洪彬）

（上接第173页）

他认为网络环境中难免存在部分对于执政党的批评意见，政党在对其予以管控的同时，也要从自身出发，尽可能地对政党本身进行组织完善，以积极态度回应社会不同意见人士的挑战。

就这一主题，研究者对于中国社会的关注重点在于如何运用网络技术更好实现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反腐倡廉建设工作。四川大学政治学院邓曦泽认为，由于信息的公开化，网络时代官员腐败的难度及风险都会变得更大，国家应利用这一管理优势，推行实施“利益背反”反腐方案，打破原有受贿、行贿双方的攻守同盟，以科学管理方法实现反腐工作的工作机制创新。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史丽琴与顾晨琳则是从“新媒体”的媒介作用分析了当下开展

反腐工作的有利条件，认为“微博”“微信”等平台信息发布的便利性，使得官员腐败行为被社会曝光的机率大大提升，相应信息公开后带来的反腐成绩，又进一步激发社会民众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对于营造反腐倡廉的社会化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除上述相对集中的讨论议题外，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王金鹏与刘宝臣以及长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吴明永等人从网络信息管理角度出发，讨论了执政党对于西藏及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及文化产业管理问题。

（严宇鸣，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周奇）